

《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喉舌”

管西荣



《红色中华》创刊号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于江西瑞金，初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1933年2月7日，从第50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瞿秋白克服种种困难，仍坚持出版了若干期，随后暂时停刊。这一阶段共出240期，发行量最高时约四五万份，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该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复刊后延续此前的期号，从第241期开始。

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发展。为便于党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中共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仍延续此前的期号。至此，《红色中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色中华》创刊号

初创刊时，《红色中华》并未设置栏目分类，大体上是将相关内容进行简单排版。从第4期设置了“专电”栏目，登载了鄂豫皖红军攻克黄安、红四军攻下石城红石寨两条电讯。之后，其栏目设置日趋完善，内容逐渐丰富，除设有“社论”“要闻”“专电”“临时中央政府文告”“苏维埃建设”“中央苏区消息”“工农通讯”“赤色战士通讯”等常规性栏目；还有一些专门性栏目，主要揭露苏区内部落后现象的“突击队”“铁锤”“铁棍”“无产阶级的铁锤”等栏目；针对民众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疑问进行解答阐释的栏目“问题与解答”“法令解释”等；主要刊登各个裁判部判决书和决议案的栏目“苏维埃法庭”等。

《红色中华》还根据一定时期宣传报道的需要，开辟一些非常规

的栏目。1934年6月23日开辟了“反日战线”专栏，主要报道苏区内外反日的活动；1936年1月16日开辟“社会之页”，展现苏区社会新风貌等等。

此外，《红色中华》还创办了文艺副刊《赤焰》，专门刊登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活报、诗歌、小说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栏目，刊发大量关于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政权建设的政策文件、消息、社论，以及典型人物和事件报道等，向苏区内外展示苏区建设进展，使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贯彻到苏区人民群众中去。同时，也对国际国内局势进行报道，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报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欺骗等等。

编辑群体经验丰富

《红色中华》的发展能够日臻完善，同该报有一群极具奋斗精神和较高业务能力的编辑群体密切相关。他们中间有留苏归来的学子——王观澜、杨尚昆、沙可夫等；有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领导人员——周以粟、瞿秋白等；也有在基层群众培养成长的工农通讯员——韩进、贺坚等。先后任该报主笔或主编的有周以粟、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向仲华等，编辑有李伯钊、徐名正、韩进、白彦博等。该报的主笔主编，之前大都或多或少有过办报办刊的新闻从业经历。他们中间有从事编辑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的编辑人员，周以粟曾任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王观澜在任中共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部长期间，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瞿秋白曾担任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主

编，也曾任《向导》《前锋》编辑，主编过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

《红色中华》的编辑群体，业务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为该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组织队伍保障。而且，该报的主笔主编多在苏维埃政府担任一定职务。第一任主笔周以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主编《红色中华》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后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由政府工作人员兼任报纸的主编工作在一定程度保证了办报的政治方向，这也体现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对《红色中华》编辑工作的重视，表明该报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苏维埃运动的指针”

《红色中华》创刊之际，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面临着如何快速地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可、加紧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问题。《红色中华》创刊后就成为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发展的重要舆论和宣传阵地、组织动员的武器和开展工作指导的平台，由此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发刊词》指明了办报宗旨：“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具体而言，该报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开展革命动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报纸的动员作用，早在开始“武器的批判”之前的大革命时期，就视“批判的武器”为重要的动员手段，用毛泽东的话说，办好报纸不仅

“不可小看”，而且具有“原则意义”。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艰苦斗争，需在短时间内实现人、财、物的高度集中，这就离不开革命动员工作，《红色中华》便承担起这个重担。《发刊词》强调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因此，该报采取了多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发动民众积极参与苏维埃政府发起的各项活动是该报的重要工作。

二是发动舆论宣传。《红色中华》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创建的强大舆论宣传阵地。一方面，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营造和引导关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面舆论；另一方面，揭发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摆脱负面舆论的影响，是该报舆论宣传的重要工作。

三是进行工作指导。《红色中华》是苏维埃政府进行工作指导的重要“武器”，直接配合政府的日常工作，成为政府管理的一个工作平台。《发刊词》指出：“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以建立巩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因此，该报要求同级的同志，“将他对于苏维埃的意见与工作经验多多写来在本报发表，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可见，进行工作指导是该报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红色中华》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创刊后，其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舆论宣传，推动了各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的进展，同时对促进党的建设也发挥了独特作用。在延安复刊的《红色中华》，又积极服务服从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表达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联合一致抗日的立场，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党报指导和开展革命工作的典范之作，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革命动员、舆论宣传和工作指导的重要媒介，积极传播党和苏维埃政府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及本报2021年5月20日刊登的《〈新中华报〉：“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8月12日刊登的《〈群众〉周刊十二年》、9月16日刊登的《〈解放日报〉改版》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重大卷本）”（项目编号：20&ZD325）的阶段性成果。】

有跨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1935年，神州国医无线电宣传委员会成立，徐相任是委员之一。该会通过当时的建华广播电台，每日下午5时至6时进行一小时的宣讲。内容包括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中医药知识、有效疗方等。徐相任在第一次宣讲时即介绍了“虚劳”（慢性衰弱）、“时疫”（流行性瘟疫）知识，并且讲解了“现代病家及医学界的谬误”。他也成了最早通过广播这种现代媒介介绍医药卫生知识的著名中医之一。

徐相任还曾担任过当时全国影响力最大的中医学学术社团之一“神州国医学会”的常务委员。并且出任过1946年全国中医师考试上海考区阅卷委员、1947年上海市中医查询阅卷委员。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徐相任在民国时期中医学界的学术地位。

他与长子徐福民（即徐彻）共同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活动。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上，留下了这位江苏名医的名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相任被上海市卫生局聘为中医文献研究所馆长，继续把自己对于中医药的毕生才学贡献给社会。同时，他也继续积极投身民进会务。在1956年8月召开的民进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和1958年11月召开的民进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徐相任分别当选为民进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鲁迅与陶成章的友谊

张雨

鲁迅的国学导师是章太炎，革命导师是陶成章。陶成章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光复会创始人之一。他著有《中国权力史》，对鲁迅的思想与革命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

鲁迅与陶成章的友谊，开始于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一次，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龚宝铨带陶成章意见鲁迅，一起谈论国事。从陶成章的谈话中，鲁迅了解到浙江农民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情况，他们聊得很投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后来，他们常在一起谈论，两人的私人交谊日益深厚。

陶成章是职业革命家，全身心投入反清革命斗争。他到鲁迅寓所来，一谈起什么地方不久可以发动起来了，便手脚并用，神采飞扬。好多次都错过了饭点。

1908年年底，陶成章介绍鲁迅加入了光复会。为了躲避日本警察搜查，陶成章将一些光复会的重要文件托付给鲁迅保管。可见两人关系的亲近与信任。

陶成章的革命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曾两次入京，企图刺杀慈禧，但均未成功，后又奔赴辽宁、内蒙古一带，察看形势，以图起义。为了革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杨绛的“不装样儿”

宋倩

1926年，杨绛正在上高中，当时她还叫杨季康，学校在暑假期间举办了“平旦学社”讲学，老师要求她做记录。

杨绛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就满口答应了，到了现场才发现，自己被安排上台记录。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不仅要上台做记录，还要跟那些元老级别的老师同台记录。面对台下乌压压的人群她又是紧张又害怕又羞愧。

等她好不容易调整好心态准备记录，却发现听不懂主讲人章太炎说的杭州官话，这可是致命的问题。作为一个记录员听不懂主讲者说什么，只知道章太炎说的是掌故，但说的是什么人事，她完全听不懂，也不知从何处记。要不假装在仔细记录？装也得装得像吧！要不乱写？可写好交卷怎么交代呢？要不画圈圈，画杠杠，可万一给人识破岂不是更糟？此时的杨绛非常尴尬，恨不得演讲赶快结束，

她好溜之大吉。但是她不能，只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

杨绛考虑了很久，决定放下笔，静下心来听章太炎讲课。即便如此，她还是听不懂一句，只好眼睁睁看着章太炎。而章太炎在侃侃而谈的同时，也频频回头看那个一字不写的记录员。就这样一直挨到结束，杨绛交了份空白的笔记就走了。

虽然暂时摆脱了尴尬，却摆脱不了媒体的报道。第二天，杨绛就上了报纸，报上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不出杨绛所料，等到开学，同学们把这个新闻当作笑料大谈特谈。老师也无奈地对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吗？”其实，老师让杨绛做记录，只是走个形式，没有指望她能记录什么。

但这就是杨绛的性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装腔作势、不弄虚作假，大大方方做人。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徐悲鸿“买马”

王兆贵

徐悲鸿画马的故事很多，人们耳熟能详；徐悲鸿“买马”的故事，您可能没听说过。

抗战时期，徐悲鸿曾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住在重庆江北磐溪石家花园。那时，徐悲鸿已是业界翘楚，尤以画马技法享誉盛名。期间，徐悲鸿筹建并创办了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中国美术学院，聘请有一定影响的画家为研究员。其中，张大千、吴作人、李瑞年、沈逸千、冯法祀、孙宗慰、宗其香等，后来都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者。

这天，徐悲鸿路过一画摊，见有人正挂出一幅奔马图，墨迹未干，落款却是自己的名字。他情知这幅画是临摹的，但看上去还有些才气，于是就买下，不去揭破他。交易间，徐悲鸿问，这画出自何人手笔？那人说，是徐悲鸿啊！徐悲鸿说，如果真是徐悲鸿画的，我就不买了。

卖画的这位叫杨竹庵，从新都来重庆，人地生疏、衣食无着。自己虽然也是个画家，但因技法尚不纯熟，未能独立风格，没有名气，即便画得再好也卖不出价钱。出于无奈，想到徐悲鸿画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吴贻芳赠送收录机

孙敏敏

吴贻芳是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女性，1979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她也是第一位女子大学的中国女校长，终生未婚，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挚爱的教育事业。

1955年3月，吴贻芳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55年4月当选民进南京市委会首任主委。1957年3月，吴贻芳又当选民进江苏省委会首任主委。

吴贻芳身兼江苏省副省长等数职，公务非常繁忙，平时虽然不驻会，但对南京民进机关工作非常关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党派逐渐恢复组织活动，南京民进也组织成员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机关各种学习会、报告会、座谈会比较多，机关工作人员记录整理材

料的工作比较重。

吴贻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多方联系，通过金陵女子大学的海外学子购买了一台收录机，邮寄给了市委会。吴贻芳说，这是送给市委会机关工作人员的，以后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时，将重要报告进行录音，回来以后能原汁原味地进行学习传达，还能发给基层会员听，大家整理材料也方便了。不久，吴贻芳又给省委会机关送了一台收录机。这给当时的机关工作以极大的便利，也引来了兄弟党派机关同志的羡慕，一时传为美谈。

吴贻芳赠送给南京民进的收录机，至今仍依然能正常使用，目前存放在位于南京钟山风景区松风阁的“南京市民主党派之家”内，默默地诉说着先生的高尚情怀，激励着后人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名医徐相任：民进最早会员之一

胡卓然

近代江苏曾诞生过一位擅治流行瘟疫（当时称为时疫）的中医名家——徐相任。

徐相任名尚志，字相宸，后改字“相任”，是民进最早的会员之一。他出生于江苏苏州，是江苏武进名医费绳甫的女婿。青年时跟随岳父学习中医之后，徐相任刻苦钻研、潜心攻读，终得有“近代一大宗”美誉的费绳甫之真传。到了中年时，他已成为“费氏医派”十三代传人之一。

近现代史上的中国社会动荡，卫生事业发展缓慢，霍乱、鼠疫等突发流行性的瘟疫不断发生。“中医传染病学”也在这一历史时期应运而生。作为此类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相任在使用中药治疗瘟疫领域颇有建树，早在清朝末年时即受聘在上海中国红十字会附设时疫医院里任职。该院救治病人曾取得了“治十可得七八”的疗效。后来，他把医疗实践里有良效的药方和自己的经验编成《脱疫证治》《时病常识》《鼠疫良方汇编》《急性险疫证

治”等多部书籍。他还多次投稿给报纸，发表过《治疫方法之研究》《用药有别之时疫》《霍乱与生理病理之关系》《警告：迫不及待之急性险疫》等等文章，并且把自己治病时归纳的“通治瘟疫屡验奇方”在报纸上发布出来。通过这些途径，向社会各界迅速普及了瘟疫的防治手段。

徐相任虽然是中医，但也以开明思想接受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西医理论。他在文章之多次记录西药治疗瘟疫的作用，并且在叙述通过消毒预防瘟疫的途径里，把西医的消毒药水“烧洗”作为“积浊下走地中”时的有效消毒手段。他还反思了在治疗瘟疫的过程中，“吾辈华医无病院居住病者，不能随时诊察”的缺憾，在实践中前往西医院开设的医院工作，与西医合作诊治瘟疫。

1931年3月17日全国最高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政府要员们纷纷兼任理事。而徐相任以名医身份名列该馆“候补理事”第一位。1931年4月9日南京国

民政府第813号指令，批准了中央国医馆章程以及理事和候补理事名单，其中候补理事即简写成“徐相任等二十五人为候补理事”。

徐相任担任设立在南京的中央国医馆候补理事，也是他和南京这座城市的重要渊源。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后，会址设立于中华门东长生祠一号。该馆呼吁和推动了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22日公布的第一部正式的中国医法规《中医条例》，改变了历史上中医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对中医的规范化管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央国医馆还组织了对于中医药的大规模学术研究、编纂、审核了一大批中医药教材和著作。作为候补理事的徐相任积极参与到国医馆工作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今还可以从历史文献里看到徐相任有关的工作记录。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他于1933年建议中央国医馆尽快“统一药名”“审定生理名词、病理名词”，并且指出“生理为医学之根本，病理为辨证之所以然”，于是应当先统一“生理病理名词”。这些见解具